

宁海旧时所创办的福利事业

●应可军

咸丰三年八月,戴德生受英国的中国宣教会派遣来华。在宁海当地邑绅协助选址城关南门建内地会福音堂,基督教会曾办过施医所、戒烟馆、育婴堂(与政府合办)、崇德小学、绸花厂等慈善事业,由此吸引教徒。翌年一月,宁海徐抚九先生与外甥杨子权尽心尽力创办习艺所。

宁海贫艺所

宁海贫艺所又称“贫民习艺所”。相当于今天下岗工人职业培训,清末省、县官办的手工业工场。收容无业贫民和部分罪犯从事纺织、制鞋、印刷、编制藤柳器具等劳动,是宁海基督教会和宁海商会合办的福利企业,民国十二年(1923)基督教会在县城创办明新小学以及施医所、戒烟所等,作为教会慈善事业徐抚九先生与杨子权等在蒲湖试院倡办平民习艺所,自任所长,门口对联就是徐抚九撰写的:“欲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在基督徒中招聘艺人,主要从事草帽编织、绸花。辛亥革命后,平民习艺所成为各地官办手工业的主要组织形式。抗日战争后已不再存在。

义人徐抚九简介

徐抚九(1859—1924),近代诗画家。原名履谦,清光绪秀才,生于宁海县城小北门书香门第,是国画大师潘天寿的启蒙老师。他自幼饱读经史,德高品正,学识渊博,诗风旷达清妙。其书法学赵松雪,又擅长山水花卉,造诣颇高。



徐抚九

老城区兴宁南路的西北角落,有一条巷弄,名称二亩园巷。二亩园,这八十多年前的雅致小园,早已踪影渺渺,但抹开了厚厚的历史尘埃,就渐渐看到了二亩园的凝重、沧桑。

1920年左右,清代县城小北门名士徐抚九,晚年营建一雅致名园,题为“二亩园”,自号“二亩园主人”。平素少与世俗交往,每徘徊于园中,以时花植树为乐。又自号“夕可轩主人”,意寓孔子所言“朝闻夕死可矣”之意。著名画家潘天寿早年受其影响颇深。今县文物办还藏有徐抚九山水条幅。徐抚九退居归里后,热心公益事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发起组织县商会,任坐办。民国十二年(1923)与杨子权等在蒲湖试院倡办平民习艺所,自任所长,招聘艺人,向贫家子弟传授技艺。于商会、义学等公益事业多有建树。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他根据宁海当时状况,针对宁海“乐苟安、畏远行、自大而夸、不务实在……”的不良风气盛行,分析宁海的历史、地理、风俗、学业、技艺、外贸、经商种种利弊,写成一篇《宁海乡谈》,要求宁人“人人明利害,识是非,谋地方之公益,图民生之幸福,宁海为己之宁海,不啻如一家,如一身。同思振作,共进文明”,在当时引起轰动。传至今日,依然可看到非同一般的见地。比如,对于商业,他提出“其关系于地方之兴衰最大”,这在重农轻商的传统中无异于惊人论。对于教育,他倡议“教习者非游学不可”,并身体力行把两个儿子徐定涛、徐定澜、长媳程美英送往美、日留学,这在清末也自然是惊人之举。此等识见,当然非一般文弱之士所能比拟。就是这样一位以积极姿态入世的知识分子。

长子徐定涛(1886—1965)号柱生,三江文理学院肄业,于1904年考取清政府官费留日。长媳程美英(1887—1929)号佩莘,是鸡行口程家人,宁波女校肄业。哥哥程干青(1872—1952)字芸生,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3月,以南洋官费留学日本,是我县最早出国的一批留学生之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工兵科第三大队学习。光绪三十一年回国,在南京任新军督练并到上海负责军队的枪械、被服等军需物资的购置工作。是我县最早参加辛亥革命队伍的爱国志士,也是宁海有名的乡绅。1905年徐定涛回国与程美英结婚,在蜜月期间,即与徐定涛同赴日本。

当时中国学生在日本任何学校均遭歧视,授课至重要学科,辄令中国学生退出讲堂,讲及时事则大肆嘲笑支那。故在日留学极易

激发爱国思想,对清廷腐败之不满油然而生。因而革命救国重于求学,为当时留学生之普遍思潮。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成立同盟会,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夫妇二人先后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留学生的反清活动引起清廷注意后,乃咨请日本当局禁止留日学生作政治聚会,对留学生严加监视,因而遭公开驱逐出境,遣送回国者有之,勒令中途退学者有之,更不乏由一校转另校,三徙三转而不得卒业者甚多。徐定涛、程美英夫妇既参加同盟会,且活动亦被视为危险分子。故徐定涛初学铁道,继改习照相制版,复转警务。(家中曾留照相机架制图用具等多年)。当时与黄兴、徐锡麟、秋瑾、宋教仁、陈英士诸人过从甚密。程美英在日习医学学科,又习师范。据说当时日本对妇女只开设此等专业学科,其它科目不收女性,对中国留学女性亦如此。

光绪三十年(1904)11月,近代革命团体光复会正式成立于上海。由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发起,蔡元培任会长,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以暗杀和武装暴动为革命的主要手段。徐、程美英二人于1910年底回国抵达上海,参加了上海光复会的活动,成为光复会会员。徐定涛、程回国参加辛亥革命,留日诸友纷纷吟诗送别以壮行色,根据后人记录保存及记忆,附录数首。

玉京仙子七香车,小滴尘寰十载余。
为问元龙湖海士,亚洲大陆有人无。
轰轰振起自由钟,意气居然玛瑙浓。
拍手快谈天下事,英雄转胜胜英雄。
无计能醒我国民,丝丝情泪湿红巾。
忍令夷夷欺凌惯,可有男儿愤不平。
眼中直如无男子,意气居然我丈夫。
二万万人齐下拜,女权先到火奴鲁。
去年携手走瀛洲,万里长风汗漫游。
笑煞春间有少妇,悔教夫婿觅封侯。
孤灯旅馆两闲闲,忽向离亭别泪弹。
自愧穷途苏季子,归来惟恐下机难。
双飞威风清时见,千里明驼祖国还。
惹得大樽无情绪,梦魂夜夜到家山。
本是明珠自爱身,金炉替却翠裘轻。
为谁抛却乡关道,白雪苍波无限程。

诗末题款:美英女士游学东京,志气倜傥,实为吾国女界之雄,於其归也,书此送之。

弟 立幹

当时活动缺少经费,但办公费用又必不可少,徐定涛、程美英二人即将在河头的祖遗银饰店“文华楼”盘于方姓,后方姓改名“紫金楼”,将资金充部里活动费用。

清宣统三年(1911),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陈其美、光复会李燮和等人,联络自治公所绅董李平书领导的商团,“中国敢死团”,响应武昌起义,准备光复上海。九月十三日,陈其美、李燮和相约在闸北和上海县城同时起义。当日午后,闸北巡警,警官陈汉钦率众占领巡警总局,闸北首先光复。下午3时,统称“革命军”的商团、敢死队、中国敢死团聚集南市九亩地宣布起义。随后兵分二路,商团进攻上海道,敢死队等进攻江南制造局。上海县城警反正,攻打顺利,至晚8时,县城内外均为革命军占领。同日下午5时,陈其美率敢死队只身进入制造局,劝说总办张士衍及士兵投降未成,陈其美被扣押。敢死队200余人冲进局门,清军反扑,敢死队被迫退出。十四日晨3时,再次进攻制造局,徐定涛、程美英均亲自参战,战斗激烈。徐定涛战斗中曾手格清兵刺刀,以致手臂等处永留伤痕。至上午9时,终将制造局全部占领。张士衍逃走,陈其美获救,上海胜利光复。九月十六日,沪军都督府(或称上海军政府)成立。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李燮和去吴淞就任军政分府总司令。上海光复后,徐定涛因参战英勇,被记特等功。徐定涛、程美英被推为外交部长与副部长。设置外交部出于当时上海有外国租界。为与外使交涉,减少干预。其实徐定涛不擅外交,所以被推任外交者。因除日语外,兼谙英语,与日英等国租界交涉中方便。程美英亦通英、日两国语言,且擅演讲,口才胜其夫。参加革命所任职务均系公推,即后来之选举,都督府对各部行文均用咨文,对外国租界则用照会,以示彼此平等,而不用命令。对光复上海有功者,均给纪念状,不称奖状,亦示平等之意,盖因“奖”字有上下对下之意,与中山先生宗旨相背。

不久陈英士与蔡元培先生意欲徐定涛、程美英接任上海海关道署,徐定涛、程美英因家产变卖殆尽,乃辞谢。后宁波李某谋得此缺,李某出身封建官僚,既得此缺不久即为宁波巨富。此时革命营中鱼龙混杂情况,亦革命未能彻底之主因。

至陈英士被刺,徐定涛、程美英乃北上至北京接孙中山先生,陈述光复上海经过。不久,改就河北高等师范学堂及南开大学任教。后复去安庆任教于安徽法政学堂等。避难于乱世。尽管被邀请再任政坛职务,但作为一位有良知和眼光的知识分子,到了这时,只有远离政坛,以消沉来表明对窃国者的忿忿然。

程美英1929年因肺炎歿于杭州,年仅43岁。徐定涛亦即隐退乡里,研究医学。居常以礼待人,不因有功国家而倨傲,且不干预县政,谦谨自守。并自备药材,于贫病者施医施药。常以读书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告诫后人,数十年自奉清简,乡里乡亲无不称誉。解放后人民政府尊为民主人士。县文化馆曾邀请出席辛亥革命老人座谈会,会上发言多赞扬孙中山先生及其他诸同仁之功德及崇高品质,极少言及自己。对解放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尤其赞赏。至1965年去世,享年80岁。

《大里村志》导读

●胡克均

据《史记》载:西汉初年“商山四皓”之一黄公,晚年隐居“鄠之大里”。宁海古属鄞县,大里之名自此始见于史书之记载。但有人说:大里系古代李氏之始居地,由“大李”一词演化而来。也有人说:亭、里犹如现在乡、村,是古代县之下的地方行政单位的名称。大里者是古代映石门内最大的村落也。

大里位于宁海县城西北约25公里处,坐落在天台山余脉第一尖(镇亭山)东北麓。此山既是浙东宁绍台三府(市)分水岭,又是宁海象山港水系与三门湾水系的发源地。入注象山港的兔溪计有四个源头,其中的柘溪、青溪、双胡溪三条溪流都在大里附近汇合,注入兔溪,汨汨东流,奔腾入海。因此自古以来,此地乃是苍山叠翠,绿水长流,深山幽谷中的一处绿洲;是勤劳、淳朴山民宜耕、宜居的家园。

据有关地方文献记载及民间的口头传说:在王氏人居大里之前,曾有李家、金家居两水之中,胡家居水东,马家居水西,杨家居住寺吞里的传说。先后有十余个姓氏曾在此定居。大里王氏乃周朝王族姬氏之后裔,始封于山西太原,改姓王。周末为避秦乱,太原王氏中一个家族东迁山东琅琊(临沂)。两晋南北朝时,为躲避“五胡十六国”之乱,琅琊王氏中一个家族南迁浙江会稽(绍兴)。这支王氏名人辈出,名扬江左。如今江南一带的王氏,大都是山东琅琊王氏之后裔。

宁海大里王氏始祖孟靖公,原籍宁海西店王家,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明朝成化八年(1472)时年24岁,他辞家负笈来大里私塾任教。适值当地一家金姓大财主的儿子因病暴卒,儿媳年轻貌美在家守寡。金老财主舍不得人财两失,在亲朋好友策划下,决定收塾师孟靖为养子,入赘金家,双方达成口头协议;金家财产归孟靖继承,生下的子女要以黄为姓。然而为时不久,老财主却驾鹤西飞,杳然而去!嗣后孟靖与金家儿媳接连生了三个儿子,他们都不愿姓金,具以父姓为姓。孟靖遂成为大里王氏之始祖。大里原是杂姓聚居之地,斗转星移、万化纷谢,其他姓氏相继消亡,王氏遂成为大里一枝独秀的奇葩。

以史为鉴是历代修志之宗旨。大里人自古以农为业,他们牢记列祖列宗披荆斩棘,开疆辟土,累堤筑坝,营造田园的艰辛,因此把土地视作生命的源泉,财富的象征。据1951年“土改”时统计材料记载,大里村有311户,1285口,耕地

1277亩,人均有一亩耕地,因此大多数人都能过上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然而世上一切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50年之后,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大里全村有576户,1634人。人口增加虽然不多,但耕地却大量减少。据一些老人口述如今许多耕地或改建为厂房、或建造成住宅,因此耕地比土改时减少了一半。目前真正以农为业的居民仅有几十户。目睹尘世沧桑,一些老人无不忧心忡忡地说:一旦发生灾荒,遇到战乱,民何以聊生?

据《村志》第二章载:解放前大里自映石门至村旁木斗庙,有水碓九座,纸槽一百余口,水磨一长。村民忙时务农,闲时做纸。以农养生,工以资用。大里村民大都过着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的生活。自改革开放之后,民营企业如雨春笋般崛起,大里到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男女老小小个个笑颜开。然而好景不长,特别是最近几年,因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营销无路,因此许多企业或改行、或倒闭,致使一些人发出路在何方的感叹!大里自古是映石门内惟一有集市贸易之地,每逢市日,附近各地的村民把自家的农副产品或肩挑,或手拎汇集到大里。二道贩子收购这些土特产,用竹筏运出映石门,远销宁海、宁波。如今公路四通八达,每天有几十趟班车进出,人们再也不以大里为物流中心,因此大里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大里自古尊师重教。据有关文献记载,早在宋元时期,此地即有儒学,明清时期办学蔚然成风。因此人才辈出:《资治通鉴音注》作者胡三省,雁苍山赤诚书院创办人胡元叔、反天主教“莽秀才”王锡桐,当代国际问题泰斗,周恩来总理外交顾问张明养……皆诞生于此或附近之地。大里人以他们引以骄傲和自豪。然而近年大里人因边缘化而产生失落感。附近各地没有小学,孩子读初中要去10里外的深明,读高中要去50里之遥的宁海城里。父母每天看不见自己孩子的身影,不知道孩子的思想和学习情况。昔日书声琅琅的文化氛围消失了。为此,难免激起一些大里人天涯何处是家园的忧思。

谨以此浅见,求教于有识之士。并希望广大读者从此书庞杂的资料中了解过去,珍视现在,展望未来。

前童“兵梢案”

●童小谦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一天,山阴道上,柳暗花明,云兴霞蔚。童清没有因情逸致欣赏沿途的明山秀水,前童到南京往返二千余里的徒步跋涉已使他疲惫不堪。他举轻若重地掖了掖肩上的包袱,包袱里藏着一张南京兵部职方司的批照,一纸牵系着童氏家族命运的薄薄公文。

这张批照与明初的方国珍“兵梢案”有关。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下令靖海侯吴祜,收编浙东庆(宁波)、台、温三郡方国珍旧部,一律充往各卫所(军营)做苦役种田,这就是《明史》所称的“方氏兵梢案”。

何为“兵梢案”?笔者认为,“梢”同“船”,兵梢即驾船或管船的士兵;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方国珍以“部卒9200人、水军14300人”(白寿彝《中国通史》)乞降朱元璋,可见方国珍兵力以水军为主,故称“兵梢案”。

当时前童村西北有后方村,住着方姓人家,与方国珍同宗。后方村方易林等六人,以及前童村童性水九人被收编充军。童氏族人远的被充到甘肃天水,近的被充到绍兴,屯种军田,以服劳役。充军者(称为“正军”)非但本人终生服役,其老疾或逃亡后,还勾取其家属甚至族人(称为“军余”)顶充,世代服役无力挣脱(王毓铨《明代的军屯》),故“兵梢案”又称“勾军案”。

洪武七年(1374),勾军惨案愈演愈烈,引起百姓极大恐慌。于是,后方方氏逃亡一空,成为空村。彼时,童氏自南宋绍定六年(1233)始迁以降,已繁衍八世,有子孙近百人,为逃避充军之祸,亦逃亡殆尽,只剩下童伯礼一家四兄弟。

是年,宁海知县王士宏上书:“迨良民为兵不可,吾宁获死罪,当为民请命。”朝廷下诏罢之,百姓才得安宁。

童伯礼是童氏第七代世祖,质性敦厚,温润儒雅,是个美男子。他立志让童氏子弟耕读传家,置六经群书数千卷,在白溪之畔创办石镜精舍,两次邀请比自己年少21岁的方孝孺先生设帐授徒,并成为忘年知己。方孝孺对童伯礼有着极高的评价:“孰知枳棘间,尚有鸾凤鸣。”

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政府进一步扩大全国屯田规模,为了使卫所军有稳定的数量,开始编造军籍黄册。这一政策终于给童伯礼家族带来了劫难。

据前童族谱载,方国珍起兵海上,罗致天下英杰名贤,如宁海名士詹鼎等,詹鼎曾写信给童伯礼,希望他一起入幕辅佐方国珍,童伯礼却以母老为辞,这封信后来被发现了,童伯礼终不能免祸。洪武二十五年(1392),童伯礼充南京高邮卫服役,时年56岁。

在古代交通信息条件下,充军远方意味着不是生离就是死别,童伯礼随身只带了一抔塔山脚下的泥土。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苦难从此开始了。在高邮卫所,童伯礼顶“种田50亩”(《大明会典》),再配耕牛一头:“还被迫承担征操守备、修渠筑堤、运输运粮等其他额

外差役”(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繁重的劳役摧残着童伯礼早已知天命的身体,充军的冤屈和劣境的愁苦更是侵蚀着他的心灵。童伯礼只能聊以一杯家乡的泥土自慰,那是一抔被族人耕作时的弧形犁尖摩挲过的泥土,那是母亲在鸢飞草长时带着孩子们放飞纸鸢踩过的泥土,那是确保童氏子衣食无虞后细雨润窗开卷读书的泥土。如今子弟们还在石镜精舍里挑灯夜读吗?千里征夫莫不归,老来南望泪频挥。

洪武二十八年(1395),童伯礼客歿高邮卫所。呜呼!生也无辜,死之何咎?三年后,方孝孺作《祭童伯礼》文:“……谓将与子,黄发燕喜(到老一起生活)。宦学于秦,不见七年。每以书来,慰我忧情。云胡不留,永恨九泉……”

但童氏族人的“兵梢案”并没有随童伯礼的去世而终止,勾军制度就像沉重的枷锁,束缚在世世代代的族人身上。每每差役一至,则凌逼难堪,前童并闻阡陌间,一次次上演了暮婚晨别、离男别女的悲惨情景。万历年间,童伯礼第六代孙童庞也歿于高邮卫所。

这是一个民弱草芥的年代,却也是一个弱者相残的年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个名叫林贵的军余(充军者家属)拿着假冒的印信文书,前来前童向童伯礼后裔敲诈勒索。在此之前,童伯礼后裔已依例回乡顶种屯田,承当军役。此次诈骗,引起童伯礼后裔童清愤慨,童清身背干粮,步行千里,告到南京兵部,领得批文到南京高邮卫所,明令禁革,又带回一纸批照,以绝童氏勾军之后患。

一部两千年封建史,更迭的只是皇权的私人姓氏,不变的是对百姓的盘剥压榨。明清鼎革后,勾军之弊尚未尽除。顺治十四年(1657),清政府又派人来前童勾军,童伯礼后裔不得不卖田筹资作为军役折银,卖田契书写道:“……先年告批童伯顶军,突今钩取军丁,一时无措,愿将上畝军田出卖三房”(《塔山童氏宗谱》)。

军田是一种国有土地,明中后期,“卫所制度开始出现屯田民田化、军余平民化的倾向”(赵艳霞《明代军屯及其私有化》)。彼时,童伯礼后裔顶种之田应该已成为民田了。今前童古镇旅游服务中心附近尚有“官田”之地名,就是“管田顶军”之田。

乾隆四年(1739),大学者齐周华为《塔山童氏宗谱》作《钩军记》时称:“兵梢一案,钩取军丁,陋习相沿,革除者方四、五十年耳。”以是年溯推45年,当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前后。

前童童氏罹方国珍兵梢案从1371年算起,至1694年已有323年左右了。一场延续了323年的劫难,何其凄惨也!

孔子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在童氏族人解脱勾军惨祸32年后即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不顾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称帝鸣泣般地哀愁乞生,将其父子用弓弦勒死。可又有谁知道多少人因为勾军惨案而成为客死异乡的冤魂呢?

所幸,童氏族人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幽而发愤,直至于人丁炽旺,人文鼎盛,成为浙东诗礼望族。



桃源桥 吴宇鸿印

宁德太姥山

(乐乐/摄)